

当代中国教育论丛



世纪之交的教育选择

——从生存的角度看教育

刘以恒 郭桂英 冒 荣 陈昌贵 著

UNCONG

湖北教育出版社

当代中国教育论丛

世纪之交的教育选择

——从生存的角度看教育

刘以恒 郭桂英 著
冒 荣 陈昌贵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世纪之交的教育选择
——从生存的角度看教育

© 刘以恒 郭桂英 著
冒 荣 陈昌贵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22 ·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湖北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9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71 000 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220

ISBN 7—5351—0992—6/G · 755

定价: 5.40 元

目 录

一 导论 1

1·1 世纪之交：生存与教育的思考 2

1·2 生存选择与人的发展 9

1·3 中西当代文化走向之比较 16

1·4 选择与超越：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 28

二 生存价值的变迁与 教育价值的选择 42

2·1 生存价值与生存需要 43

2·2 当代生存价值的冲突和发展 51

2·3 生存价值与教育价值 70

2·4 教育价值的历史考察 79

2·5 现行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与融通 104

2·6 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价值选择 133

三 道德选择及其在 教育上的实现 165

3·1 当代伦理道德现状概览	166
3·2 学会关心：面向 21 世纪的道德选择	181
3·3 当代伦理道德体系的发展 及其教育实践	188

四 学习化社会：教育 发展的必然走向..... 201

4·1 从教育社会化到学习化社会	202
4·2 学习化社会与教育观、学习观的变革	212
4·3 教育如何推进学习化社会的进程	229

五 综合生存能力的培养 与教育模式的选择 254 |

5·1 从学历社会到能力社会	255
5·2 综合生存能力的界定与结构	263
5·3 教育模式的历史变迁与现实选择	276
5·4 素质教育：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模式	288

结束语.....	309
----------	-----

一 导 论

世纪之交往往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在这种时刻，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处于一种非稳定状态，面临着上升和下降两种可能性。这种情形正如一首诗中所说的：

“在命运的伟大天平上，
天平针很少不动。
你不得不上升或下降，
或者受罪，或者凯旋……”

生存的这种非稳定状态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显得更加突出。是上升还是下降？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具有双重内涵。其一是选择的“本体论”问题，即面向新的世纪应当作出怎样的选择，才能使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向更高的层次跃迁？其二是选择的“认识论”问题，即从什么角度对这种选择作出探索和回答？对这个问题当然也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我们感到，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角度，终究要归结到未来的人的问题，即如何造就具有新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能力、能够解

决新的生存问题的人。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面向新世纪生存选择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人的问题，那么教育就不只是对选择作出反应，而是以强有力的方式参与选择，参与塑造一个人们期望的 21 世纪的过程。这种信念，支持着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当代的生存选择问题。

1·1 世纪之交：生存与教育的思考

1·1·1 生存的忧患

上个世纪末的先哲们曾对当时人类生存的非稳定状态作过全面的探讨。他们探索的领域涉及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政治革命，物理学的危机，生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化论思想推广到宇宙和人类社会所引起的伦理观念的变革，科学的发展对审美观念的拓广等方面。其探索的成果为后来者的生存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引发了本世纪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两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

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有幸跨进 21 世纪的人们，在享受这两大革命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品尝着我们自己种出的佳实和酿下的苦酒。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现实和未来的新的生存问题，都在这个时空变换的临界点上承受着生存的压力，表现出历史的忧患。这种忧患是关于生存

的忧患。

就世界范围来看，由于支持人们生存的文化系统、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现实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生存问题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了现代人们关于生存忧患的出发点和内容实质的不同。^①

西方的忧患意识是以人本主义和未来主义这两种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表现了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忧患，主要集中在人类新获得的力量与驾驭这种力量的能力、物质生活的丰裕和人的本性的迷失之间的矛盾。而西方未来主义则表现了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忧患，即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使自然人化的同时，向自然贪婪地索取而使自然丧失了自身，反过来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西方这两种形式的忧患意识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危机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表面原因，尽管如此，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西方的忧患意识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西方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对社会政治军事广泛渗透所导致的与文明相背离的社会后果，以及

① 参见张雄、周细刚：《当代中西忧患意识比较》，《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22期。

资本主义商品化渗透到一切领域所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

我国当代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社会发展方面。具体而言，有对民主意识的要求与反“和平演变”、反腐败的政治忧患；有富国强民的经济要求与落后的生产发展水平不协调的经济忧患；有由于当代中西文化的碰撞所导致的文化忧患（此处的文化是狭义的）；有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价值冲突的伦理道德观上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完善与急于富国强民的心理矛盾；反映了新旧体制交替中愚昧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导致的价值困惑；反映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影响与改革开放中所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站在当代世界文明的高度扬弃传统文化、重构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和努力。这些矛盾、冲突、困惑与探索，是继本世纪中叶我国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的又一次生存选择。这次选择，关系到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迅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在 21 世纪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关系到我们全民族的素质和综合生存能力能否得到迅速提高；也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的

“球籍”问题。

1·1·2 教育面临的问题

教育是培养人才、继往开来的事业，它分担着社会的忧患和难题。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在碰到难以解决的生存问题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教育。

从历史上看，教育也确实没有辜负人们的厚望。它曾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才。它曾为二次大战后日本国的经济振兴注入了活力。它已经作为产生人力资本的“制造厂”而受到世界企业界和经济学家们的青睐。

教育自身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教育着手解决社会提出的新的生存问题时，总是首先改变自己。教育史上的几次重大变革，都是在满足社会与人的新的生存需要的过程中发生的。因此，面对当代的生存问题，世界教育界对教育自身的变革提出了种种构想，试图进行一场教育的全面变革。

但是，在着手进行教育的全面变革之前，至少有四个问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其一是教育所处的社会及所面对的个人希望从教育得到一些什么？这就是教育价值和生存价值的关系问题。其二是教育所处的时代提出了怎样的生存问题？这涉及教育变革的历史前提和出发点的问题。其三是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社会和个人的生存提供一

些什么？

这是与教育变革的目标和对象相关的问题。其四是教育应当怎样做和实际环境允许教育怎样做？这是教育行为模式变革的问题。这四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本书的论域。

社会和个人希望从教育中得到的东西，有时候并不是生存所迫切需要的；生存所迫切需要的东西，有时候也不是教育所能提供的；而且教育已经做的；往往也不是教育应该做的和社会要求它做的。

这就是说，在现实的教育中，存在着教育价值与生存价值之间的差别，存在着教育的设定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别，存在着教育的现实行为模式、理想行为模式和允许行为模式之间的差别。然而，一种符合社会和人的生存需要的教育在这些方面应当是基本统一的。因此，为了解决 21 世纪的生存问题，必须消除现行教育中存在的三个差别，这是我们构想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1·1·3 全新的生存条件

当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时，深切地感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指导思想，为寻求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合理解决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后来进一步指出，三个面向的真谛就在于面向世界。这是中国在 21 世纪能否以全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

因为正如钱学森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①，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同时又是进行经济、科技、政治等方面的总体战争的战场。这场战争将要延续到 21 世纪，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在这场全球性的总体战争中，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首先，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当代世界性的经济竞争中我们还处于劣势。我们唯一的优势是劳动力低廉，而这种优势在下个世纪上半叶也将丧失殆尽。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正在加紧实施，而且动辄利用“经济制裁”手段逼迫我们在政治上就范。面对如此情状，我们必须注重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通过全面的文化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教育改革，培养“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人，由他们去赢得这场总体战争的胜利，赢得经济、政治、科技、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全面的文化凯旋。

为达此目的，我们不能不考虑促进和制约人的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进程和全球性问题。

前苏联学者费多闲耶夫在《人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文中，列举了当代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新条件。第一，世界更新过程在变化，人类从陈旧过时的社会组织形式向崭新的、

① 参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 19 期。

更完善和更人道的社会组织形式过渡。社会联系、家庭制度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要求人们适应这种变革。第二，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的劳动活动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实质是：人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要求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第三，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经形成了相当复杂的问题，到了非作出根本性选择的程度了：或是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条件进一步恶化，加剧自然环境对人的压力；或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化，成为人的健康和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第四，人们提高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水准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根本的问题是，现代文明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同时，如何满足人的精神、智能、审美和道德发展等多种多样的需要。第五，人自身社会过程的变化和国际因素的变化，使人类面临着全新的形势。热核战争的威胁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人类文明自身存在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这五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生存的新条件，而新的生存条件又要求人自身必须改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将把“生存—文化—教育”所结成的链条，作为探讨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问题的基本逻辑构造。

1·2 生存选择与人的发展

1·2·1 生存的选择即文化选择

何谓人的“生存”？简言之，人的生存就是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发挥自己的潜能，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进行输入和输出的动态过程。这种过程分为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①。因此，人的生存即生产和生活，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人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与他人结成社会关系，构成社会，面对自然。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问题。

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生物性的方法和文化的方法^②。人类解决生存问题主要是依靠文化的方法。毛泽东在《水调歌头·读史》中写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在人类的童年时代，靠磨制石器来解决生存问题，磨过的石头便是最初的文化。可以说，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人类从磨石头开始，就越来越多地依

① 参见李秀林、李淮青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② 参见〔美〕W·A·哈维兰著：《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靠自己的思想发明来维持生存，而较少地依靠生物的适应性来解决生存问题。尽管人类不可能完全摆脱生物适应性，但是文化无疑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主要手段。从本质上看，文化是保证人类群体持续存在的一种体系，是一个经训练而习得的，告诉人们如何生存的各种传统的综合体^①。因此，对生存问题的探讨应当抓住文化这一人类生存的根本，并从广义文化的视野来审视一定社会和群体的生存历史、现实和未来。

“文化”是少数几个难以定义的概念之一。我们赞同钱穆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七个要素，即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②。（我们把其中的“宗教”理解为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认识 and 追求）。这些文化要素是人类生存的不同侧面。人类依靠它们增加了生存的机会，有了生存选择的余地。因为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要素的有机系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和社会总是选择文化系统中的某些要素，作为一定时期解决生存问题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所谓生存的选择实质上是人和社会对赖以生存的文化要素的选择。

① 参见〔美〕W·A·哈维兰著：《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② 钱穆著：《文化学大义》，中正书局（台湾）1952年版。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文化系统中的各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构成了当时的生存条件和相应的生存需要。人们总是根据当时的生存条件和生存需要，有选择地发展文化系统中的某些要素，而且有重点地优先发展其中的某个要素，把它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点，从而形成一定时代的生存的文化历史特征。

我国古代社会把政治、宗教（即对宇宙生命的终极关怀）和道德这三个要素作为生存的主要因素，并把道德精神置于文化的最高层面，作为整个文化系统的一种纲维性和笼罩性的东西，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与人生存的文化历史特征——“德性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基本方面即伦理之教、王道之治、中庸之道^①，就分别体现了教育的道德化、政治的道德化和实用理性的道德化。荀子所持重的“人禽之辨”，强调的是情感的道德化；而孟子所提出的“义利之辨”则反映了经济的道德化；后来朱熹所注重的“天理人欲之辨”则以物质欲望的道德化为鹄的。总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道德成了广义文化系统中的主导元素，呈现出文化的道德化特征。然而，由于当时经济的萎缩、政治的僵化、智慧的压抑和情

① 参见刘真著：《中国文化前途》，载《人文思想与人文教育》，水牛出版社（台北）1986年版。

感的扭曲，古代的道德教育家们希望看到的“仁政”和“好德者”并未出现，孔子曾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又说“苛政猛如虎”。由此可见，忽视文化系统中的其他要素而单项突出某一要素，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和社会的生存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经济、政治、科学、教育、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自 5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治的一部分内容即阶级斗争作为制导一切的总纲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国文化在总体上呈现出了政治化的特征。经济、科学、教育、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无一不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诚然，政治应当也必须统帅这些方面，但是政治的统帅作用主要体现在领导权和政治方向上，而不是用政治斗争的规律去取代其他领域所特有的规律，不是用政治的方式去解决各个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这一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历史昭示我们，在一定条件下选择文化系统中的某一要素作为解决生存问题的主元，这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份单项突出某一文化要素，使这一要素成为整个文化系统的特征而单一化之后，不但不能解决人和社会的生存问题，反而会